

中国科举文化通志 主编 陈文新

四书大全校注（上）

【明】胡广 杨荣 金幼孜等 纂修

周群 王玉琴 校注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中国科举文化通志 主编 陈文新

四书大全校注（上）

【明】胡广 杨荣 金幼孜等 纂修

周群 王玉琴 校注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书大全校注.上/(明)胡广等纂修;周群,王玉琴校注.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11

中国科举文化通志/陈文新主编

ISBN 978-7-307-17083-4

I.四… II.①胡… ②周… ③王… III.①四书 ②《四书大全》
—注释 IV.B2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57042 号

责任编辑:朱凌云 责任校对:黄添生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47.75 字数: 1047 千字 插页: 4

版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7083-4 定价: 610.00 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中国科举文化通志》总序

陈文新

(一)

科举是中国古代最为健全的文官制度。它渊源于汉，始创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兴盛于明、清两代。如果从隋大业元年（605）的进士科算起，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被废除，科举制度在中国有整整 1300 年的历史。科举制度还曾“出口”越南、朝鲜等国，扩大了汉文化的影响。始于 19 世纪的西方文官考试制度，其创立也与中国科举的启发相关。孙中山在《五权宪法》等演讲中反复强调：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胡适也说：“中国文官制度影响之大，及其价值之被人看重”，“是我们中国对世界文化贡献的一件可以自夸的事”。^①

科举制度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其原因在于，它在保证“程序的公正”方面具有空前的优越性。官员选拔的理想境界是“实质的公正”，即将所有优秀的人才选拔到最合适的岗位上。但这个境界人类至今未达到过。不得已而求其次，“程序的公正”就成为优先选择。“中国古代独特的社会结构是家族宗法制，家长统治、任人唯亲、帮派活动、裙带关系皆为家族宗法制的派生物，在重人情与关系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若没有可以操作的客观标准，任何立意美妙的选举制度都会被异化为植党营私、任人唯亲的工具，汉代的察举推荐和魏晋南北朝的九品官人法走向求才的死胡同便是明证。”“古往今来科举考试一再起死回生的历史说明：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与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防止人情的泛滥，使社会不至于陷入无序的状态，中国人发明了考试，以考试作为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秩序的调节阀。悠久的科举历史与普遍的考试现实一再雄辩地证明，考试选才具有恒久的价值。”^②从这一角度看，科举制度不但在诞生之初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较之前代的选官制度，如汉代的察举、征辟制和魏文帝时开始推行的九品中正制等，科举制度都更加公正合理。

① 胡适：《考试与教育》，《胡适文集》第 12 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08 页。

② 刘海峰：《科举学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13、136 页。

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对于维护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稳定，其作用是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的。胡适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虽然一再愤愤不平地说到中国文化的种种不是，但在《考试与教育》一文中，他也毫不含糊地指出：在古代那种交通极为不便的情形下，中央可以不用武力来维持国家的统一是由于考试制度的公开和公平。胡适所说的公平，包括三种含义：一是公开考选，标准客观。二是顾及各地的文化水准，录取的人员，并不偏于一方或一省，而是遍及全国。三是实行回避制度，“就是本省的人不能任本省的官吏，而必须派往其他省份服务。有时候江南的人，派到西北去，有时候西北的人派到东南来。这种公道的办法，大家没有理由可以反对抵制。所以政府不用靠兵力和其他工具来统治地方，这是考试制度影响的结果”^①。这些话出于胡适之口，足以说明，即使是文化激进主义者，只要具有清明的理性，也不难看出科举制度的合理性。

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不仅具有历史研究的价值，而且有助于我们思考当今人事制度的改革问题。2005年，任继愈曾在《古代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值得借鉴》一文中提出设立“国家博士”学位的设想。其立论前提是：我国目前由各高校授予的博士学位缺少权威性和公正性。之所以不够权威和公正，不外下述几个原因。其一，“各校有自己的土标准，执行起来宽严标准不一，取得学位后，它的头衔在社会上流通价值都是同等的”，这当然不公平。其二，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年大部分时间用在外语上，第二年大部分时间忙于在规定的某种等级的刊物上发论文，第三年忙于找工作，这样的情形，怎么可能培养出货真价实的博士？其三，几乎所有名牌大学都招收“在职博士生”，有的博士研究生派秘书代他上课，甚至不上课而拿文凭，这样的博士能说是名副其实的吗？只有设立“国家博士”学位，采用统一标准选拔人才，这样的“博士学位”才具有权威性和公正性。而国家在高级人才的选拔方面统一把关，不仅可以避免“跑”博士点和博士生扩招带来的许多弊病，有助于社会风气的改善，而且，由于只管考而不必太多地管教，还可以节省大量开支。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的确是值得参考借鉴的。任继愈的这篇文章现已收入《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有心的读者不妨一阅。

与任继愈的呼吁相得益彰，早在1951年，钱穆就发表了《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制度》一文。针对民国年间（1911—1949）人事管理腐败混乱的状况，他痛心疾首地指出：科举制“因有种种缺点，种种流弊，自该随时变通，但清末人却一意思变法，把此制度也连根拔去。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数。不可不说我们把历史看轻了，认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铁铸成大错”^②。钱穆的意思是明确的：参考借鉴科举制度，有助于人事管理的规范化和公正性。1955年，他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无

^① 胡适：《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06页。

^② 钱穆：《国史新论》，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版，第114~115页。

论如何，考试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中一项比较重要的制度，又且由唐迄清绵历了一千年以上的长时期。中间递有改革，递有演变，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发展，这绝不是偶然的。直到晚清，西方人还知采用此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之偏陷，而我们却对以往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有过上千年以上根柢的，一口气吐弃了，不再重视，抑且不再留丝毫顾惜之余地。那真是一件可诧怪的事。”^① 现代中国的人事管理理应借鉴源远流长的科举制度，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如何借鉴，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二)

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以其“程序的公正”为国家选拔了大量行政官员，在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准和维护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稳定方面，发挥了直接而巨大的作用，这是其显而易见的功能；它还有其他不那么显著却同样值得重视的功能，即意识形态功能和人文教育功能：科举制度以其对社会的整体影响力将儒家经典维持世道人心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我们试就此略作讨论。

明清时代有一项重要规定：科举以《四书》《五经》为基本考试内容。这一规定是耐人寻味的。《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是秦汉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维系人心、培育道德感的主要读物。我们经常表彰“中国的脊梁”，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秦汉以降，“中国的脊梁”大多是在儒家经典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以文天祥为例，这位南宋末年的民族英雄，曾在《过零丁洋》诗中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丹心”，就是蕴蓄着崇高的道德感的心灵。他还有一首《正气歌》，开头一段是：“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为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身在治世，正气表现为安邦定国的情志；身在乱世，则表现为忠贞坚毅的气节。即文天祥所说：“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1282年，他在元大都（今属北京）英勇就义，事前他在衣带中写下了这样的话：“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四书》《五经》的教诲，确乎是他的立身之本。

文天祥是宝祐四年（1256）状元。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它表明：进士阶层在实践儒家的人格理想方面，其自觉性远远高于社会的平均水平。宋代如此，明代如此，甚至连元代也是如此。清代史学家赵翼曾论及“元末殉难者多进士”这一现象：“元代不重儒术，延祐中始设科取士，顺帝时又停二科始复。其时所谓进士者，已属积轻之势矣，然末年仗节死义者，乃多在进士出身之人。”（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三十《元末殉难者多进士》）接下来，赵翼列举了余阙、泰不华、李齐、李黼、王士元、赵琬、周鏊、聂炳元、刘耕孙、丑闾、彭庭坚、普颜不花、月鲁不花、迈里古思等死难进

^①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9页。

士，最后归结说：“诸人可谓不负科名者哉，而国家设科取士亦不徒矣。”^① 在元末殉难的进士中，余阙（1303—1358）是最早战死的封疆大臣。他的朋友蒋良，一次和他谈起国难，余阙推心置腹地说：“余荷国恩，以进士及第，历省居馆阁，每愧无报。今国家多难，授予兵戎重寄，岂余所堪。然古人有言：‘为子死孝，为臣死忠。’万一不幸，吾知尽吾忠而已。”余阙殉难后，蒋良作《余忠宣公死节记》，开篇即强调说：“有元设科取士，中外文武著功社稷之臣历历可纪。至正辛卯，兵起淮、颍，城邑尽废，江、汉之间能捍御大郡、全尽名节者，守豫帅余公廷心一人而已。”^② 在余阙“擢高科”的履历与他忠勇殉节的人格境界之间，人们确认有其内在联系。无独有偶，《元史·泰不华传》在记叙元末另一著名的死节之臣泰不华（1305—1352）时，也着重指出：其人生信念的基本依据是他作为“书生”所受的儒家经典教育。在与方国珍决战前夕，泰不华曾对部从说过一番词气慷慨的话：“吾以书生登显要，诚虑负所学。今守海隅，贼甫招徕，又复为变。君辈助我击之，其克则汝众功也，不克则我尽死以报国耳。”“书生”“所学”与捐躯“报国”之间关系如此密切，足见以《四书》《五经》作为基本考试教材的科举制度，它在维持世道人心方面的作用的确是巨大而深远的。

儒家经典维持世道人心的功能不仅泽及宋元，泽及明清，甚至泽及已经废除了科举制度的现代。其实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原因在于，不少现代名流的少年时光是在科举时代度过的，他们系统地受过这种教育，耳濡目染，其人生观在早年即已确立并足以支配一生。儒家经典的生命力由此可见。科举制度的余泽亦由此可见。

这里我想特别提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并有意多引他的言论。之所以关注他，是因为，世人眼中的胡适，只是一个文化激进主义者，以高倡“打倒孔家店”著称。人们很少注意到，胡适在表面上高呼“打倒孔家店”，但在内心里仍对孔子和儒家保留了足够的敬意，是儒家人生哲学的虔诚信奉者和实行者。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第二章有胡适的如下自白：“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很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我对十二世纪‘新儒学’（Neo-Confucianism）（‘理学’）的开山宗师的朱熹，也是十分崇敬的。”“在这场伟大的‘新儒学’（理学）的运动里，对那（道德、知识；也就是《中庸》里面所说的‘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的）两股思潮，最好的表达，便是程颐所说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后世学者都认为‘理学’的真谛，此一语足以道破。”同一章还有唐德刚的一段插话：“‘要提高你的道德标准，你一定要在‘敬’字上下功夫；要学识上有长进，你一定要扩展你的知识到最大极限。’适之先生对这两句话最为服膺，他老人家不断向我传教的也是这两句。一次我替他照相，要他在录音机边作说话状，他说的便是这两句。所以胡适之先生骨子里实在是位理学家。他反对佛教、道教乃至基督教，都

①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06页。

② 杨讷等编：《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编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8页。

是从‘理学’这条道理上出发的。他开口闭口什么实验主义的，在笔者看来，都是些表面账。吾人如用胡先生自己的学术分期来说，则胡适之便是他自己所说的‘现代期’的最后一人。”^① 胡适是在少年时代接受儒家经典教育的，在经历了废止科举、“打倒孔家店”等种种变故后，儒家的人生哲学仍能贯彻其生命的始终，由此不难想见，在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科举时代，儒家经典对社会精神风貌的塑造可以发挥多么强大的功能。虽然生活中确有教育目标与实际状况两歧的情形，但正面的成效仍是不容忽视的。

“精神文明”是中国人常用的一个概念。“精神文明”是相对物质文明而言的，就个人而言，需要长期的修养，就民族而言，需要长期的培育。中国古人对这一点体会很深，所以常常强调“潜移默化”，经由耳濡目染的长期熏陶，价值内化，成为一种道德规范。如果这种道德规范大体近于人情，既“止乎礼义”而又“发乎性情”，它对社会的稳定，对人类精神境界的提升，都将发挥重要作用。这就是文化的功能。目前教育界所说的“深厚的人文知识素养，有助于塑造高尚的精神世界，提高健康的审美能力”，与这个意思是相通的。《四书》《五经》作为科举时代的基本读物，人文教育功能是其不容抹杀的价值，并因制度的保障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美国学者罗兹曼认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科举制在 1905 年被废止，从而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就其现实和象征性的意义而言，科举革废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这种转折大致相当于 1861 年沙俄废奴和 1868 年的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② 罗兹曼的意见也许是对的。而我想要补充的问题是：在科举制废止之后，如何保证《四书》《五经》的人文教育功能继续得到发挥？

(三)

科举制度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科举制度对现代中国的发展更有足资借鉴的意义。整理与研究历代科举文献，其意义也需要从历史与现实两个角度加以说明：一方面是传承文化，传承文明，让这份丰厚的遗产充分发挥塑造民族精神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去粗取精，古为今用，让它在现实的中国社会重放异彩，成为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智力资源。这是我们编纂出版《中国科举文化通志》的初衷，也是我们不辞劳苦从事这一学术工作的动力。

《中国科举文化通志》重点包括下述内容：

1. 整理、研究反映科举制度沿革、影响及历代登科情形的文献。

^① 胡适：《胡适文集》第 1 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18、433 页。

^② [美] 吉尔伯特·罗曼兹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35、635 页。

从《新唐书》开始，历代正史多有《选举志》。历代《会要》、《实录》、《纪事本末》等史传、政书之中，相当一部分是关于科举制度沿革的资料。还有黄佐《翰林记》、陆深《科场条贯》、张朝瑞《明贡举考》、冯梦祯《历代贡举志》、董其昌《学科考略》、陶福履《常谈》等一批专书。历代《登科录》和杂录类书籍，也保存了大量关于科举的材料。唐代登科记多已散失亡佚，有清代徐松的《登科记考》可供参考。宋元登科记保存稍多，明清有关文献尤为繁富。

2. 整理、研究与历代考试文体相关的教材、试卷、程文及论著等。

八股文是最引人注目的考试文体。八股文集有选本、稿本之分。重要的选本，明代有艾南英编《明文定》、《明文待》，杨廷枢编《同文录》，马世奇编《澹宁居文集》，黎淳编《国朝试录》等；清朝有纪昀《房行书精华》，王步青编《八法集》；还有《百二十名家集》，选文3000篇，以明代为主；《钦定四书文》，明文4集，选文480余篇，清文1集，选文290余篇。稿本为个人文集。明清著名的八股大家，如明代的王鏊、钱福、唐顺之、归有光、艾南英，清代的刘子壮、熊伯龙、李光地、方苞、王步青、袁枚、翁方纲等人，均有稿本传世。相关著述数量也不少。清梁章钜《制义丛话》等，是研究八股文的重要论著。其他考试文体，如试策、试律等，也在我们关注的范围之内。这些科举文献，一般读者不易见到，或只能零零星星地见到一些，或虽然见到了也难以读懂，亟待系统地整理出版，以供研究和阅读。

《中国科举文化通志》包括以下数种：《历代制举史料汇编》、《历代律赋校注》、《唐代试律试策校注》、《八股文总论八种》、《七史选举志校注》、《四书大全校注》、《游戏八股文集成》、《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明代状元史料汇编》、《钦定四书文校注》、《翰林掌故五种》、《贡举志五种》、《〈游艺塾文规〉正续编》、《钦定学政全书校注》、《梁章钜科举文献二种校注》、《〈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二十世纪科举研究论文选编》、《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礼部韵略〉与宋代科举》、《元明科举与文学考论》、《游戏八股文研究》、《明代八股文选家考论》、《唐代科举与试赋》、《〈儒林外史〉的现代误读》、《科举废止前后的晚清社会与文学》等。我们这套《中国科举文化通志》，以涵盖面广和分量厚重为显著特征，可以从多方面满足阅读和研究之需。而在整理、研究方面投入的心力之多，更是有目共睹。我们的目的是为推进学术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中国科举文化通志》是一项规模宏大、任务艰巨、意义深远的大型出版文化工程。编纂任务主要由武汉大学专家承担，并根据需要从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厦门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扬州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高校或科研院所聘请了若干学者。南京大学卞孝萱先生、中华书局傅璇琮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邓绍基先生等在学术上给我们提供了若干指导；参与这一工程的各位专家不辞辛苦，努力工作，保证了编纂进度和质量；武汉大学出版社鼎力支持《中国科举文化通志》的出版；所有这些，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

2015年4月13日

于武汉大学

目 录

上

前言	周 群 1
进五经四书性理大全表	6
御制性理大全书序	朱 棣 8
四书集注大全凡例	9
大学章句序	11
读大学法	19
大学章句大全	21
大学或问	85
中庸章句序	131
读中庸法	138
中庸章句大全	140
中庸章句大全上	140
中庸章句大全下	194
中庸或问	249
中庸或问卷上	249
中庸或问卷下	274
读论语孟子法此朱子采二程子说	311
论语集注序说	315
论语集注大全卷一	322
论语集注大全卷二	349
论语集注大全卷三	373
论语集注大全卷四	398
论语集注大全卷五	417

论语集注大全卷六.....	441
论语集注大全卷七.....	471
论语集注大全卷八.....	502
论语集注大全卷九.....	523
论语集注大全卷十.....	546
论语集注大全卷十一.....	564
论语集注大全卷十二.....	587
论语集注大全卷十三.....	612
论语集注大全卷十四.....	630
论语集注大全卷十五.....	660
论语集注大全卷十六.....	684
论语集注大全卷十七.....	697
论语集注大全卷十八.....	720
论语集注大全卷十九.....	733
论语集注大全卷二十.....	750

前言

《四书》自南宋光宗绍熙四年(1190年)朱熹刊行以来,遂成为在中国影响至大的思想文献。宋学肇兴,《四书》更超越于儒家经典——“五经”之上。元代儒士也十分重视《四书》,吴澄15岁始读朱熹《大学章句》,刘因本于卢孝孙之《四书集义》而成《四书集义精要》三十卷,许谦作《读四书丛说》四卷,詹道传作《四书纂笺》二十八卷,朱公迁作《四书通旨》六卷,倪士毅作《四书辑释》二十卷,等等。其中尤以《辑释》(详后)、《纂笺》与《通旨》成就为大。《纂笺》正音读,考名物,学风务实。《通旨》将《四书》原文条分缕析,以类相从,“于天人性命之微,道德学问之要,多能剖其疑似,详其次序,使读者因此证彼,涣然冰释”。^①当然,《四书章句集注》之后,对《四书》的流布影响最大的还是明代永乐年间纂成的《四书大全》。

明代初年,解缙上书建议修书,方法是“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②,也就是要远溯先秦儒学之绪,近承宋代理学之脉,这实际开启了明代修三部《大全》的先声。永乐十二年(1414年)十一月,明成祖命翰林院学士胡广、侍讲杨荣、金幼孜等纂修《五经、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谕曰:“唱圣贤精义要道,其传注之外,诸儒议论,有发明余蕴者,尔等采其切当之言,增附于下。”^③虽然上谕要求二书“务极精备,庶几以垂后世”,但其后又下诏催促成书。永乐十三年九月,《四书大全》编成,明成祖朱棣御制序文,颁行天下。就其内容而言,《四书大全》主要是承绪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而成,诚如魏裔介所言:“《集注》者,《四书》之孝子忠臣,而《大全》者,又《集注》之孝子忠臣也。后之欲窥圣人之道,非《集注》何由进,非《大全》则《集注》之微言奥义亦几不明。”^④该书援据的蓝本是元代倪士毅《四书辑释》。对于《四书辑释》的成书缘起,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有云:

自朱子作《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之后,黄氏(幹)有《论语通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六《四书通旨提要》,中华书局影印本,第301页。

② 《明史》卷一百四十七《解缙传》。

③ 《大明太宗孝文皇帝实录》卷一百五十八。

④ 《兼济堂文集》卷三《四书大全纂要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释》，而采语录附于朱子章句之下则始自真氏(德秀)，名曰《集义》，止《大学》一书，祝氏(宗道)乃仿而足之，为《四书附录》。后有蔡氏(模)《四书集疏》，赵氏(顺孙)《四书纂疏》、吴氏(真子)《四书集成》。昔之论者病其泛滥，于是陈氏(栎)作《四书发明》，胡氏作《四书通》。而定宇之门人倪氏合二书为一，颇有删正，名曰《四书辑释》。^①

但自从明永乐年间《四书大全》纂成，颁之学官之后，诸书皆废。对《四书大全》的不足之处，顾炎武已有批评，谓其内容“特小有增删，其详其简或多不如倪氏，《〈大学〉、〈中庸〉或问》则全不异，而间有舛误”。而《五经大全》之“《春秋大全》则全袭元人汪克宽《胡传纂疏》”，“《诗经大全》则全袭元人刘瑾《诗传通释》”。乃至视其为“上欺朝廷，下诳士子”之作。其实，顾炎武所谓“上欺朝廷，下诳士子”也难说是允评，《四书大全》的作者并没有“欺”、“诳”之意。刊行之时，该书的《凡例》即明文写道：“凡《集成》、《辑释》(即吴真子《四书集成》、倪士毅《四书辑释》)所取诸儒之说，有相发明者采附其下，其背戾者不取。凡诸家语录文集内有发明经注，而《集成》、《辑释》遗漏者，今悉增入。”其《凡例》所列，凡一百又六家，也就是说该书的本意即是综汇众说而成一统。这其实也是朱棣的御旨，据《大明太宗孝文皇帝实录》卷一百五十八记载：“(永乐十二年十一月)甲寅，上谕行在翰林院学士胡广、侍讲杨荣、金幼孜曰：《五经》、《四书》，唱圣贤精义要道，其传注之外，诸儒议论，有发明余蕴者，尔等采其切当之言，增附于下。”择取的标准以“发明经注”为是。明代修纂三部《大全》的主观动机是“章一代教学之功，启百世儒林之绪”。当然，这一目标并没有完全达到，“启百世儒林之绪”更是如此，后世的儒士们并没有完全为《四书大全》的奉敕而作所牢笼。其后不久，阳明心学兴起，形成风行天下之势，更改变了程朱的为学路径。但“章一代教学之功”恰恰道出了《四书大全》对明人科考、教育的巨大影响。据《明史·选举志》记载：

后颁科举定式，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②

明代科选，基本沿唐、宋旧制，但试士方法有所改变，这就是考试内容“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命题试士”^③。即都以《四书》、《五经》试士。而自《四书五经大全》颁行以后，诸注疏皆废，成为科考的不二标准，乃至其后“二

① 《日知录集释》卷十八《四书五经大全》，岳麓书社 1994 年版，第 649~650 页。

② 《明史》卷七十《选举志二》，中华书局点校本，第 1694 页。

③ 《明史》卷七十《选举志二》，中华书局点校本，第 1693 页。

百余年以来，庠序之所教，制科之所取，一禀于是”^①。也就是说，该书不但被悬为功令，还是庠序课读的范本，进德修业的标准，即如学者所记之“颁诸学宫，永为遵守”^②。于是该书滋育了一代代的儒士，明代儒士如薛瑄、王守仁等“彬彬盛矣。至一代之风俗，上有纪纲，下重名节。当变故之秋，率多仗义死节之士；值权奸之际，不乏敢言直谏之臣。贤士大夫之公评，士庶之清议，是非井然。一有不当中人心，群起而议”^③。当时风教敦穆，高攀龙认为这都与教育、科考以《四书五经大全》为标准，儒士深受《四书》、《五经》的沐染有密切关系。

其实，《四书大全》不但是明代科举的重要文献，同时对于《四书》学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方面，从对《四书大全》成书的远近渊源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四书大全》之成书，实乃宋元明儒的共同创作，该书从某些方面体现了《四书》在宋元明的流变史。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长期以来，论理学必称宋明，元代在理学发展史上的地位隐而不彰，其实，元代不但在仁宗延祐年间恢复科举，以《四书集注》试士，悬为令甲，朱学的统治地位得到了巩固，同时，元代儒士们对《四书》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正是他们的孜孜努力，明代理学才在此基础上进入新的境界。可以说没有元儒的研究作为基础，就没有《四书大全》。此外，《四书大全》在明代被悬为功令，对明代儒士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就内容而言，《四书大全》中除了朱熹的《章句集注》之外，主要引述的是元代儒士的成果，也就是元代儒士对《四书》以及《章句集注》的理解成为明代儒生们为学的基础，为人的准则，内化于明代士人们的心灵深处。更广而言之，此后的理学也抹上了元儒的色彩。因此，了解《四书大全》的学术源流、成因，不单单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也是一个对元明以来数百年文化传统的认识、判断的问题。而朱熹虽然对于《四书》功莫大焉，然著述繁多，辨说亦多，其间也偶有问答未及审核者，亦有后来考证未及追改者，还有门人各自记录润色增减或失其本真者，因此文集、语录之内异同矛盾亦不一而足，即使《四书章句集注》与《或问》也时有牴牾。当时门人编次，既不敢有所别择，后来读朱熹之书的儒者遂一字一句奉为经典，不复究其传述真伪、年月先后，往往执于一见而诋排众论。《四书大全》则汇次了有关《四书》的诸家众说，各援所据，不但使朱熹的思想更加明晰，而且对于理解《论语》等儒家经典亦具有重要的作用。

但是，《四书大全》乃仓促成书，时人陈燧常曰：“始欲详，缓为之。后被诏促成。诸儒之言，间有不暇精择，未免牴牾。”^④对此，《四库全书总目》亦有云：

初，明永乐间胡广等奉诏撰《四书大全》，阴据倪士毅旧本，潦草成书，而又不善于剽窃，庞杂割裂，痕迹显然。虽有明二百余年悬为功令，然讲章一派从此而

① 高攀龙《高子遗书》卷七《崇正学辟异说疏》。

② 魏裔介《兼济堂文集》卷三《四书集说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高攀龙《高子遗书》卷七《崇正学辟异说疏》。

④ 《国榷》卷十六，成祖永乐十三年九月己酉条。

开，庸陋相仍，遂似朱子之书专为时文而设，而经义于是遂荒。^①

基于《四书大全》的成书背景，今点校《四书大全》，固然需要再现明代功令之原貌；同时，还需要尽量克服原作仓促粗疏之憾，以利传承学术；更由于《四书大全》之成书，乃是经历了长期的文化积累过程，而并非明人胡广等人的一时之作，其中熔铸了大量宋元学人的劳动，因此，我们此次选取了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庆源堂刻本为底本，参以陆陇其三鱼堂刊本（1698年嘉会堂刊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及《四书大全》所援引之原始文献进行校勘。之所以选择弘治本为底本，是因为这一刊本除了胡广等人所撰的《四书大全》之外，还附了王元善的《通考》及黄洵饶之《附纂》。其中王元善之《通考》大量采辑了程复心之《四书章图》，以及许谦、朱公迁、吴澄、吴程等人《四书》研究成果。诚如其于《大学或问》终页题识所记：“《四书大全》旧板漫灭，翻刻讹谬，本堂敬求颁降原本，命善书者抄誉绣梓印行天下，视他本大不侔矣。”确实该版本刊刻虽不十分精美，然内容颇为准确可依。选择清人陆陇其三鱼堂本作为参校本之一，主要是因为三鱼堂本订讹辨析尤多。四库馆臣谓之：“是编取胡广书，除其烦复，刊其舛谬，又采《蒙引》、《存疑》、《浅说》诸书之要，以附益之，自较原本为差胜。”虽然对其中的讹误未能全部廓清，但是就学术而言，该书已较原著有所改进。该书是陆陇其历六年而成的精心之作，且经过周縯等86位后学门人以及38位姻戚同宗精心校对而成。弘治本与三鱼堂本、四库所收永乐本参校聊可弥补永乐本《四书大全》仓促成书之不足。当然，由于三鱼堂本篇帙浩繁，此次校注不得不将书中所附明蔡清《四书蒙引》、林希元《四书存疑》以及陈琛《四书浅说》等割舍。同时，由于《四书大全》是一部广采众书而成的著作，因此，此次校注力求索寻所引文献原作进行校对，期以更符合原貌。当然，由于《四书大全》被悬为功令，异文并不多见。

《四书大全》所引注文的内容情况比较复杂。有些直接引述原文，有些间接引述大意。此次标点，对有文献可依凭的不是原文的材料不用引号，其余的引文用引号标出。朱熹作《或问》是因“诸家之说纷错不一，因设为问答，明所以去取之意，以成此书”^②。亦即朱熹《或问》中的问答语都是朱熹所言，因此，本书对《或问》中的问答语不一一以引号标出，以求文理贯注。当然，由于《四书大全》所据文献存佚也各有不同，我们虽然尽可能搜寻诸种原始文献，但其中的疏漏可能仍有不少。

《四书》原文以及朱熹集注文字宋元明诸儒士训注已颇为详尽，因此，此次训注，主要对一些颇为鲜见的人名、地名，古今殊异的词汇以及朱熹《章句集注》之外注文所涉的有关内容进行简要诠释。

《四书大全》乃明人编纂的一部著作，内容概可分为四个层次：一、《四书》原文。二、朱熹《章句集注》、《或问》文字。三、宋元明诸儒对《四书》、《章句集注》、《或问》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七《三鱼堂四书大全提要》，中华书局影印本，第314页。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五《四书或问》提要，中华书局本，第294页。

的诠释文字。四、对宋元明诸儒所引文字的释文。本书据此四个层次分别采用不同的字号。因注文内容浩繁，《论语》、《孟子》原文以及朱熹《或问》内的段落难以显示，因此，我们汲取了原刻的标示方法，即将四书原文以及朱熹《章句集注》的段落开始以○标出，期以在标识段落的同时，又不断原文脉理，保持原文风貌。原文又因朱熹所撰《论语序说》和《孟子序说》中朱熹自有注文，为了以示区别，我们采用两种不同的字体标出。

本书王玉琴博士付出了大量的劳动，王逊参加了部分点校工作。本书注文参酌吸取了有关《四书》的既有成果，因为注文条目琐细，谨对相关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请谅解。本书初稿完成后，承陈文新先生仔细审读，提出了诸多十分宝贵的修改意见，订正了许多讹误，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学识所限，加之全套丛书行将付梓，虽然主编陈文新教授一再宽宥时限，但因篇制较大，仍感时间甚促，校注之讹误之处一定还有不少，谨祈读者批评指正。

周 群

2015年2月20日于南京大学

进五经四书性理大全表

翰林院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奉政大夫臣胡广、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讲臣杨荣、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讲臣金幼孜等，兹者伏蒙皇帝陛下命臣等文学之臣，编辑《五经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今编辑已成，谨誊写二百二十九卷，装潢成帙进呈，臣广等诚惶诚恐，稽首顿首。

上言伏以六经之道，昭如日星，经纬乎天地，贯彻乎古今，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用之于身而身修，行之于家而家齐，推之于国而国治，施之于天下而天下平，盖世必穷经而后道明，未有舍经而能治理者也。是以圣王垂宪，必资道以开人；贤哲肇基，必稽古以作范。故伏羲则《河图》而演画，大禹因《洛书》而锡畴，孔子删《诗》、《书》，修《春秋》，寓一王之法，周公陈王业，制礼乐，弘百世之规，况乎精一执中之传，尤重于丁宁告戒之旨。如斯显迹，昭然可观。自王道既衰，异说蜂起，燔烈秦火之余，穿凿汉儒之弊，其间存者不绝如丝，莫能究其指归，一切趋于苟且，夤缘故习，鲜克正之於乎！圣人之道不得，而百世无善治；圣人之学不传，而千载无真儒，遂令往辙之难寻，益发前修之永叹。夫否必有泰、晦必有明，繇夫濂洛关闽之学兴，而后尧舜禹汤之道著。悉扫蓁芜之弊，大开正学之宗。不幸屡阨狂言，既扬复抑，又因循数百年之间，卒莫能会其说于一，盖必有待于今日者矣。

天启圣明，诞膺景运，太祖高皇帝天纵之圣，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教兴太平，首建学校。颁赐书籍，作养人材。茂隆政治，四海内外，翕然同风。钦惟皇帝陛下，文武圣神，聪明睿智，缙承大统，绍述鸿勋，成功盛德，虽三皇而无以加；事业文章，与二仪而同其大治。已至而犹以为未至，功已成而犹以为未成。体道谦冲，游心高远，乃者涣起宸断，修辑六经，恢拓道统之源流，大振斯文之委靡。发舒幽赜，钩纂精玄，博采先儒之格言，以为前圣之辅翼。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地负海涵，天晴日皦，以是而兴教化，以是而正人心，使夫已断不续之坠绪，复属而复联；已晦不明之蕴微，复彰而复著。肇建自古所无之制作，缙述自古所无之事功。非惟备览于经筵，实欲颁布于天下。俾人皆由于正路，而学不惑他歧，家孔孟而户程朱，必获真儒之用，佩道德而服仁义，咸趋圣域之归，顿回太古之淳风，一洗相沿之陋习。焕然极备，猗欤盛哉！窃尝观之，周衰道废，汲汲皇皇，以斯道维持世教者，惟师儒君子而已。未有大有为之君，能倡明六经之道，绍承先圣之统如今日者，此皇帝陛下所以卓冠百王、超越千古者也。